

魏源慈善思想的历史考察*

周娟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改革家、史学家,同时他的慈善思想亦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面相。魏源慈善思想的产生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个人思想发展的必然。魏源的慈善思想内容丰富,特点鲜明,融贯古今中外的“多元”思想于一体,实现“统一”,起到了开启风气、启蒙后世的作用,在各个维度均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魏源慈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

关键词:魏源;慈善思想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6)S1-0029-04

作者简介:周娟,女,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1840年前后,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而这一时代的烙印必然深深铭刻于生于其时的魏源的思想中。魏源是其时间名遐迩的思想家、鸿儒巨硕,成为当时与后人研究的焦点也不足为奇。现今学界对魏源的哲学思想、史学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经济思想、人才伦理思想等^[1]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且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纵观之,目前学界尚鲜有人对魏源的慈善思想进行系统论述,而这样的研究确实是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诚如美国学者何伟亚在言及马嘎尔尼使华时所说的:“对这些过去相对忽视的面相进行更深入的史实重建,必将进一步丰富马嘎尔尼使团的形象和历史意义。”^{[2]29}同理,对魏源慈善思想的研究对丰富魏源的时代形象和魏源思想的历史意义亦有莫大的益处。本文拟针对魏源的慈善思想展开粗浅的研究,以求教于学界前辈、同仁。

慈善,英文为“philanthropy”或“charity”;《辞海》对“慈善”一词的解释为“心地仁慈善良。《北史·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沈浮,自得而已’”^{[3]84}。伏尔泰曾言:“了解过去时代的人们是怎样想的,要比了解他们是怎样行动的更为重要”。对魏源慈善思想的研究正是基于此而言。

一、魏源慈善思想探源

蜚声海内外的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曾言道:“为探求根源,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回到那一斗争和混乱的熔炉中去。”^{[4]5}故对魏源慈善思想渊源的探究我们也要“介入往昔”,“移情”到其时的生活,体会“应运而生”一词的真实含义。

(一)家庭传统的熏陶

魏源曾祖魏大公,幼年“失怙”,事祖母及母亲,以孝闻名于乡里。以种田经商为业,且善于经营,“家素饶,好施予。”每次遇到贫穷之人必定慷慨解囊,邓显鹤对此言曰:“每挟棉袄复襦,出遇褴褛者,辄与之”^{[5]1939}。魏源祖父志顺,曾在家乡建立起储藏谷物的“万石谷仓”,他亦是一个慷慨于人的乡贤,“笃行著邑乘。”^{[6]847}据魏氏《族谱》记载,陶澍早年时期生活拮据,无以为继时曾向魏源祖父求助,旋即得到了资助。后陶澍为官,曾专门遣人还来借款,但志顺对来说:“钱财为流通之物,吾非借以谋利,愿尔主人在官清廉,爱百姓足矣。”此佳话真实地再现了魏氏族人与人善的品质。及至魏源父亲一辈,共有兄弟两人:魏辅邦、魏邦鲁。魏辅邦,“生平好施与,邻里中待以举火者数家;穷而无告者,必月有常给,以养终身”。在百姓中深有威望,当地凡举大事,皆需他“倡其首而董其成”^{[7]10}。魏邦鲁,即是魏源的父亲,关注民生疾苦,在任职期间,“值岁大灾,捐赈施粥施药,昼夜在厂与饥民同寝食者数月。”且他精通医道,其慷慨助人一如先贤族人,微薄的俸禄,大部分用于接济他人。诸如,在听到邓显鹤说起同县家境贫寒的曾乘谦、毛万秋时,“即各寄二十金为炭资。”^{[8]10}魏氏家族的最终衰落也是缘由于“毁产代输”^{[9]618}引起的。魏氏先贤们的言传身教与优良传统,必然会植根于魏源身上,体现出家庭传统的印痕。

(二)湖湘文化的孕育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亦即是说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精妙结合。盖言之湖湘文化有五大特点(关于此,各家有不同的论述,兹引代表性的观点),即:“一是,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二是,心怀天下,勇于献身;三是,关注现实,

* 收稿日期:2016-04-21

体用结合;四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五是,兼收并蓄,改革创新。”^{[10]15-22} 这些优秀的湖湘文化传统,必然会流淌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魏源血液之中,这其中亦包含有慈善救助思想。凸显湖湘慈善思想的例证即是“《信心应验录》汇编善书约 150 种,是清代最大型的善书”^{[11]31}。传统文化方面以儒、佛为例来说明。首先是儒家文化,从儒家的观点来看,“慈即为仁,而仁就是爱人。”^{[12]29} 可见,儒家提出的“仁者,爱人”表达的就是一种仁善之说,其所追求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3]159} 的大同理想社会,也是儒家慈善思想体系的另一种表述。魏源对儒家文化有很深的造诣,1813 年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求学,求教于其时经学大师,在儒家思想的大路上快步前进。据李瑚研究魏源所作《默觚》所得,“从其的思想体系来看,仍属于儒家孔孟,以及诸子如老、荀、管、扬等人的思想范畴。”^{[14]500} 其次是佛教文化,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受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改造较多,逐渐实现了“中国化”,以一种较似儒家说教的方式来劝导人们从善,“积善余庆”。魏源对佛教典籍的深入研究是由于“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最终是为了“求一安心立命之所”^{[15]73}。据此,魏源自 1828 年开始研习佛典开始,就对此念念不忘,直到 60 岁时皈依佛门。此外,他还翻译了《无量寿经》、编纂《净土四经》等佛教经典著作。

(三)时代现实的需要

黑格尔曾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16]12} 魏源 1794 年出生之时,清朝已经处于由盛转衰时期,社会整体运转在“火山口”上,魏源亦自称为“积感之民”^{[17]1}。两年后,便爆发了白莲教的大规模起义;尤其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有些农村地区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膝深的河水里,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8]1} 中国社会中的所谓“细浪”一波接着一波侵袭着下层民众,更多的农民走向破产与赤贫化,这些“细浪”具体来说有: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农业生产条件的破坏与农民离村;土匪、军队和饥谨;宗族分裂;文化因素等导致了近代中国流民群体的逐渐壮大^{[19]25-91},社会贫困人口急剧膨胀,原有的救济措施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洪秀全领导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即是例证;另一方面,中国的先进开明人士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开始“睁眼看世界”,加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敢于向西方学习,他们基于对古今关系的认识来加强对中外的认识,即“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20]12} 魏源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诚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言:“挑战愈强,刺激就愈大。”^{[21]174} 这些合力直接催生了魏源近代慈善思想的出现。

二、魏源慈善思想的内容与特点

魏源慈善思想包罗万象、内涵丰富,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之所以如此,既与历史际遇有关,又同个人经历相联系。具体来说如下所述。

(一)魏源慈善思想的内容

1. 防灾备灾。湖南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20]3} 湖南先民的生活也是“率守耕农”,且湖南自古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农业易受影响。如,1841 年时,“邵阳、石门三四月,湘乡、衡山夏,长沙、善化、临湘、武陵均大水,谷价腾贵。”^{[22]86} 这样的情形不胜枚举。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关于自然灾害的大量记载亦体现了他的灾患意识。呀瓦岛,“原有火山、地震”^{[23]517};葛刺岛,“春雨秋旱,岁只一收”;火山喷发之时的情形是:“发焰冲天,大石飞起,烧炼溶流,房屋倒塌,五谷尽坏,万有余人灭亡也”^{[23]541}。基于自身的考虑,魏源树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慈善思想,“新国之济贫也,未灾预防其贫,既灾则防其愈贫”^{[23]1616} 正是此思想的真实写照。针对于此,中央与地方政府应该“对症下药”,做到“遇丰年,多积米麦,饥岁以常价菜之,如所谓常平仓者。”^{[23]1085} 做到未雨绸缪,防灾于未然。

2. 济贫救弱。贫弱之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与生活的边缘,是困扰社会稳定发展的一大突出问题,同时他们也一直是慈善活动的救助对象,魏源对此一阶层亦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对救助此阶层群体的工作共分了三个层次。首先,对于济贫工作的关键之处是“先立一济贫之法”,提供法理上的保障;其次是设立专门的收养机构,对鳏寡孤独者的收养办法是“创立美色近厝”^{[23]523};美国广泛设立“济贫院”,此外还专门教育残疾人的机构,“又聋、盲、哑者,原属无用,今国内立仁会设馆训习,如聋哑者亦以手工调音而教之,盲者即有凸字书,使他以手揣摩而读”^{[23]1617};欧罗巴人“在处皆有贫院,专养一方鳏寡孤独。”“又有幼院,专育小儿。为贫者生儿举之无力,东之有罪,故特设此院,令人抚育,以全儿命。”饥民如若有弃子者,皆“许人收养”^{[24]318}。最后为施舍粥、米等生活物资,“赈饥之法,莫善于散米”^{[24]370};“赈粥以救饥者,所以悯其死而致之生也。”^{[24]369} 这三个方面构成了魏源慈善思想的“合理内核”,充分考虑与解决了社会上的贫弱群体的基本生存难题。

3. 教养兼施。对贫民的管理与救助要做到“标本兼治”就必须彻底解决其生存能力问题,针对此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即是:使其习得技艺,掌握生存立命的本领。魏源也注意到了慈善应该由传统“以养为主”转换为“教养兼施”的模式。欧罗巴人设立的“贫院”,“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残废之人亦不废”“务使曲尽其才,而不为天壤之废物”^{[23]1085} 美国的监狱“分善恶两途”,“前收监者无事业,今则一日不能闲,并有善书,于礼拜日前诵,”所以,收到的实际效果是“今之犯法收监者,出狱后痛改前非,且前此监中所费极多,今犯人作工营生,故每年除支外,反有余资。”对贫弱之人进行职业能力培训,终使其自食其力,此乃是慈善之举最上策也。

(二)魏源慈善思想的特点

1. 兼容并包性:儒、释、道慈善之意蕴。首先,魏源作为嘉道年间今文经学的健将,儒家思想的巨擘,著有《诗古微》、《书古微》等儒家经典著作,深谙儒家思想中以“仁”、“仁政”、“留余庆”为基本内核的慈善思想。儒家思想中“仁”的核心为“爱人”,是与慈善最为接近之处;“施惠”、“救

济”是“仁政”的具体体现,同时亦是儒家慈善意识的直接写照;“留余庆”思想则构成了儒家“慈善意识”中的动力系统。^[25]魏源言道:“极贫赈济,或散米,或煮粥,无容赘矣,然赈法须公。”^{[24]320}既体现了儒家慈善意识中对灾民的关切与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又折射出了儒家追求的“公”,在赈灾时的真切实践。其次,晚清是居士佛学兴盛之时,魏源即是此时的代表人物之一。佛教传入中国后不断与传统伦理思想融合,实现了本土化,在这一过程中,佛教本身所具有的向善功能日益强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与形式劝导人们从善,如佛教经典《法华经》中劝诫向善之人要“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魏源对此不可能不知。最后,魏源亦著有《老子本义》一书,对黄老思想了然于心。他曾言:“无为之治,非不可用于世”^{[26]643},亦即是说对于道家的思想可以实行适度的“拿来主义”。《老子》第七十九章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27]291}。在老子看来:“天道”大象无形,变化莫测,但却可以实施奖惩功能,要求世人要与人善。如若“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28]60}此种记录在道家学说经典中俯拾即是,此种意识也必掺杂于魏源的慈善思想之中。

2.批判创新性:古今中外慈善之理念。“清治至道光而极弊,清学至道光而始变。”魏源所处的时代赋予其“多元与统一”的特征:既有古今之比,又有中西之较。中国古代即已有慈善意识与活动,如楚国发兵攻打卫国之时,就曾先给卫国人民好处,“减户税,免旧欠,赦罪人,救济穷人和寡寡人等。”^{[29]128}中国传统的慈善活动,诸如:蠲免、仓储、义庄义学、普济堂、养济院、漏泽园、保节堂、义桥义渡、敬节堂、同善堂等,这些活动不仅惠及其时之民,而且思想遗产泽被后世,成为一脉相承的“时代温度计”;但是,传统的慈善思想也有自身的不足之处:开放性不足、有一定的功利性与宗教性、民间慈善发动不足等。魏源对于国外的慈善思想与机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介绍地理自然情况的同时,亦译介了社会百科知识,这其中就有:“病院”、“幼院”、“仁会”等济贫机构,与此同时也注意这些机构的运营机制、资金来源、社会效果等。魏源针对于此,积极介绍西方国家的现代慈善理念:教养兼施、政府与民间共同管理、资金来源多元化等。基于古今中外的慈善活动,富有改革精神的魏源创造性地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慈善理念:继承合理的传统慈善思想与实践形式,改革其中的不合理与不足之处;积极引进西方国家的现代慈善器物与制度,融合于“中国化”的新慈善事业之中,期待产生如西方“无游民,寡盗贼”的效果。

3.适时条理性:区别对待异时之思维。魏源的慈善思想不是一味地接济贫民、乞丐,而是具有很强的条理性,表现出了区别对待、实事求是的成熟理性化思维。魏源在《救荒事宜十条》中把救荒途径分层梳理:赈济、赈菜、赈贷、担粥法、劝捐、安流民、稽察、收养、掩埋、禁戏,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方法,举实例以证明之,如《兴国张公救荒记》,最后魏源赞叹道:“公之政,轻重缓急先后有序,将使志生民者,推而行之”^{[24]378}另,魏源主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济贫,以陕西为例云:针对陕西“高地沙土”的地域情况,在“每虞岁歉”时,应该采取的措施是“种甘薯”,因为“惟甘

薯一种易种易收,水旱冰雹均不能伤,以充民食,与米麦同功,非寻常果品可比。”此外,还要“广行桑蚕”、“兴修田功”、“广植树木”、“分积社粮”^{[24]607}等,这些做法在当地均取得很好的实际社会功效。

三、魏源慈善思想的评价

如胡适感慨所言:“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30],魏源慈善思想萌芽初起之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经过百年的历史沉淀,终可见于世人。另一方面,“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也不能孤立地观察和判断他们的言论和行动。”^[31]对魏源慈善思想的评价亦是如此。

(一)启蒙性

湖南人在近代“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20]3}在鸦片战争后这样“人心激昂”的时代,湖南人更是“开通其耳目,充浚其智慧”^{[32]156},当其时“大声疾呼者,可不谓之豪杰之士哉?魏源即是时代塑造的“豪杰”。魏源的“发聋振聩”之声,不只是经世致用、社会革新、御辱海外,还包涵有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魏源的慈善思想囊括中外、横贯古今,既是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中西思想延伸、碰撞下的新慈善观的缔造者,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开化风气、拓展眼界的实际效果,对日后的慈善思想亦起到了启蒙与革新的作用。我们只稍看一下中国近代的慈善事业发展史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魏源慈善思想的震撼性与预见性。新变化与新气象在中国慈善事业中不断涌现,凸显这一变化的表征为:“具有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的酝酿萌生和公益性质的慈善事业的初步扩展。”^{[12]240}具体为:一是,教养兼济,更重视教这一面相。其时的慈善家普遍认为:“似教更重于养。”^{[33]184}维新时出现的“迁善所”,清末民初出现的“贫民工艺所”、“苦工院”“贫民工厂”等均是这一思想在现实中的映射;二是,救济范围不断扩展。慈善事业不仅要惠及贫民,还要惠及罪犯等,把罪犯列入收养的范围,减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不仅在本埠或本宗族开展,而且还应该突破地域限制,树立“慈善无界限”的理念;三是,关注“开风气、正人心”的活动^{[34]268}。而这些在魏源的著作中皆是能找到雏形或源头的。

由此看到,魏源站在“西学东渐”的开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和潮流发展趋向,积极进行改革创新、体用结合,开启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新的发展之幕,促进其新陈代谢的进程。他之所以能做到这般,重要的一点毋宁说是由于当时的世界面对的情形是“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局限性与片面性日益成为不可能。”^{[35]276}且魏源慈善思想的继承者在其后动荡的岁月中,切实把慈善发展为了社会的“安全阀”。

(二)局限性

1.政治色彩强。魏源生活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古今中西各种思想出现碰撞、调适、会通,一方面为其提供了思想的养料,另一方面社会的现实也逼迫他带有很强的政治性。

魏源的恢弘著述皆是有感其时而著：“有感于国势的危险，感于内忧外患的交迫，感于‘天朝’优势的丧失。”^[36]¹⁷⁵⁶缘此导致他的慈善思想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民间公益慈善性质的成分大大退却。

2. 宗教思想浓。据研究表明^[37]，魏源受宗教的影响较多，不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国外的天主教，抑或是南洋西洋各个教门，这一点投影到他的慈善思想中似一柄“双刃剑”，既有有利于劝诫向善的一面，也有破坏慈善的一面。以佛教为例，封建政府唯恐佛教组织的慈善公益活动动机不正，即通过慈善救济笼络人心，从而构成封建政权稳定的潜在危害力量，故悲田养病坊等这些宗教慈善福利机构最终被强行纳入王权的管辖之下，不利于慈善事业的正常发展。

3. 实际操作差。魏源的慈善思想大多还只是停留在了简单的介绍引进层面上，并没有开展大规模的慈善实践活动，虽然也有关关注贫民生计、救济灾民的举动，但与此后的大慈善家相比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甚至还略显得有些幼稚。关于这一点，我需要说明的是：后人不应该站在不可同日而语的时代下去苛求前人什么，我们应当从历史的三棱镜中探析出当代慈善事业的正确发展道路：浓郁的人文关怀氛围，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激发民间慈善的活力，发挥慈善事业淳化风气、提升文明、安抚民心、共建和谐的功效，这才是后来人应该做的。

参考文献：

- [1] 夏剑钦,熊焰.魏源研究著作述要[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
- [2] 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3] 辞海(增补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 [4]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M].王小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5] 邓显鹤.宝庆府志·国朝传·善行下:卷百三十八[M].长沙:岳麓书社,2009.
- [6] 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7] 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卷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3.
- [8] 陈其泰,刘兰肖.魏源评传: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9] 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M]//魏源全集:第二十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
- [10]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湖湘文化述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 [11] 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 [12] 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3] 礼记·礼运[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 [14] 李瑚.魏源研究[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2.
- [1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34[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6]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17] 魏源.圣武记[M]//魏源全集:第三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
- [18]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19] 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20]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21]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M].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22] 湖南自然灾害年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
- [23] 魏源.海国图志[M]//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
- [24]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M]//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
- [25] 李鹏.儒家慈善意识与现代慈善理念[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 [26] 魏源.老子本义序[M]//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
- [27] 傅佩荣.傅佩荣细说老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28] 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9]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30]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Z]:1927-01-25.
- [31] 陈雪薇.历史视域下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J].历史研究,2014(1).
- [3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台北:台北里仁书局,2000.
- [33] 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34] 周秋光,张少利,许德雅,等.湖南慈善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6] 葛荣晋.明清实学思潮史:下卷[M].济南:齐鲁书社,1989.
- [37] 李志威.魏源宗教思想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1.

(责任编辑:陈伟)